

理想藏书



最佳读本

拨开重重迷雾 直击历史真相

历史悬案

真相娓娓道来 秘密层层揭开
全方位感受人类文明
零距离接触真实历史

大全集

读史可以明智，前提是这个历史必须真实。而历史上许多细节真相被掩盖了，形成许多悬案。现代文明中，人们需要知道这些悬案中各种“记载”不详的历史，更要知道被遮蔽的“客观”历史细节的真相，让被歪曲颠倒的历史面貌复原，让被封存的证据得以再现，让历史遗存得以重新认识，得到新的阐释或评价。在破译这些历史悬案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鉴往知来，提升智慧。

杨红林 翟文明 编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拨开重重迷雾·直击历史真相

历史悬案 大全集

(第三卷)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
杨红林 翟文明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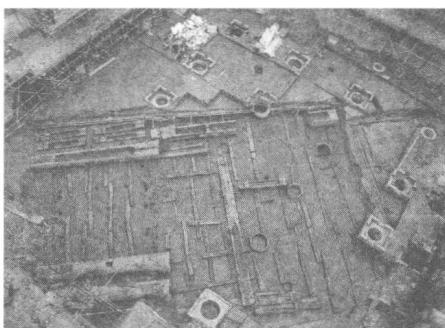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神秘的巴蜀古国文明

四川古称巴蜀，“巴”指川东，“蜀”特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今天的四川简称蜀，“蜀”是象形文字。《说文解字》称“蜀，葵中虫也。”说它是桑树中的虫，也就是蚕，这些象形字中有很多都像是长着大大眼睛的蚕。传说中第一代蜀王名叫蚕丛，最大的功绩就是教民种桑养蚕，正因为这样，后人爱戴他、崇拜他、敬仰他，尊奉他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而蚕丛又有“纵目”的异相特征，因此“蜀”字很可能就起源于对蚕丛形象的客观描绘，而“蜀”也是一个族名、国名、地名被流传下来。历史上一直认为巴蜀地区偏居西南一隅，是一片蛮夷之地，建国前人们还相信“蜀无礼乐，无文字”的说法。但建国后的考古工作证明，四川地区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是无礼仪的荒夷之地，它的文明和中原文明一样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中的一“元”。它与中原文明有什么联系呢？三星堆怪异的铜像、僰人高挂陡崖的悬棺等等吸引着世人的眼睛。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走进这个曾经辉煌的古老国度呢？

巴蜀古国的考古发掘

大家都知道，四川在秦朝后被称为“天府之国”，说是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改变了以前四川地区有水则涝、无水则旱的局面。那么是不是以前这个地方就穷苦不堪呢？成都市的几处发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在1958年底、1986～1987年经过两次发



四川成都蜀文化遗址

掘，在商代的地层内，发现了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房顶、梁架、墙体、桩基、地梁等，基本保存完好。大型地梁式宫殿建筑与小型干栏式建筑浑然一体，错落有致，分布面积为1.5万平方米以上。在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南北延伸的数千米，还发现多处商周时期古遗址，它们的规模和形制与十二桥相同，应该是成都这个总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么大的建筑规模和成熟的建筑艺术说明在商周之际的成都已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地区。2001年2月以来在成都市金沙村发现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年代当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分布范围约3平方千米，遗址内有明显的规划迹象，各部分的功能有不同的区域划分，每一处都有一定的布局结构。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其中包括金器40余件、青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近300件等计2000余件，还发现大批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大量的物品和成熟的城市设计理念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这个地区的经济已经发展得不同凡响。墓葬的奢华程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成都市商业街在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处被确定为蜀王开明氏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墓坑中现存船棺、独木棺葬具17具。船棺规模、形制宏大，最大的一具长达18.8米，为其他地区所未见。随葬品虽被盗过，仍出土陶器103件、铜器20件以及漆、木器153件等。并且遗迹显示，墓葬之上还应该有布局规整的地面建筑。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古巴蜀国和中原一样礼乐并重的话，我们同样可以从考古工作者那里找到证据。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1953年到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北郊清理了一座大型土台，这个土台残高10米，台底103.6米见方，最上层31.6米见方，为三级四方形土台。关于土台的年代，开始定为西周到战国。后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土台始建年代应该是商代。关于土台性质，一般认为是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或古蜀国巫觋通天地的神坛，即大型礼仪中心。

1980年在四川新都发掘了一座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大型带斜坡墓道的土坑木椁墓，椁内分出棺室和8个边箱，棺具为独木棺，椁室出土青铜器188件，青铜器多5件成组或2件成组，显示出特殊的礼制。作为古代文明重要标志的乐器在巴蜀大地上也有发现，1972年在重庆涪

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就出土了 14 件一组的错金编钟。另外不少器物上的宴乐图案中也常有针对乐器和歌舞的描绘。

至于巴蜀古国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个问题，考古工作者给出的答案也是肯定的。20世纪 70 年代他们在四川的郫县发现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在新都发掘出一件有铭文的青铜戈，1973 年在重庆万县发现一件有铭文青铜戈，1959 年在湖南常德 26 号战国墓出土一件巴蜀铭文青铜戈，这些青铜戈上的文字似汉字而非汉字，为确证巴蜀有文字提供了重要的物证。1979~1980 年在四川省青川清理 82 座土坑墓时发现了 400 多件器物更有说服力，从其中出土的秦武王时在巴蜀推行田律的木牍看，这批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和晚期。同时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划文字，既有汉字，又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符号，这些符号与汉字夹杂在一起，为巴蜀符号确属文字提供了坚实依据。

从以上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得知，古巴蜀国至少在秦以前就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那么这些文明的起源又在哪里呢？它是怎么传播和发展的呢？它与中原的文明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面对人类好奇的追问，滔滔的江水、巍巍的青山都沉寂无言。

巴人王朝为何湮没

提起“巴人”也许会让人感到陌生，但只要想起四川一带又称“巴蜀”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一著名典故，可能头脑中会有这样一种朦胧印象——巴人不就是居住于我国西南的古老民族吗？是不是喜欢浑身涂上油彩，头戴羽毛，跳奇怪舞蹈？也许你还会觉得落后、蛮荒的感觉。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完全对的，神秘的巴人早在公元前十几世纪就有可以与中原强大的商王朝相媲美的青铜文明。巴人祖先和黄帝是同一支，还是独立地创造了长江文明的源头？曾经极其辉煌的巴国社会生活状态怎么样，最终又为何湮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猜测。

巴人起源于湖北清江下游长阳的武落钟离山。巴人为夺取盐业资源曾与以盐水神女为代表的某个母系民族展开争战，并赢得了战争。这是巴人与盐的第一次结合。其后，“巴盐”与“盐巴”在三峡一带上演了一场横贯数千年的大剧。巴人领袖廪君战胜盐水神女后，在清江边



(清江古称夷水)建筑夷城，建立了巴王国。这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巴人建立的第一个巴国。巴人以虎为图腾，好鬼神，实行祖先崇拜，廪君则是他们最伟大的祖先。在以后的历史中，巴国的军队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联盟军，成为前锋部队，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打败了殷商军队。战后巴人受封于国。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巴子”、“巴子国”。此后，巴国在楚国和秦国两大强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节节退守，终被秦国所灭。

对于巴国的文明，有人说是同黄河文明并列的长江文明的源头。巴人在湖北的生活有个漫长发展过程，独自由原始氏族形成众多部落，再到后来组成5个核心部落“巴、樊、覃、相、郑”，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平等相处，无君臣之分。当各部落不断壮大，终于到了需要一个君主统领联盟的时候——“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廪君胜出，成为巴人领袖，由于团结，从此强盛起来。而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迁入四川，在险山恶水中，独自产生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在迄今发现的巴人的许多文物上，都有着被专家们称之为“巴蜀图语”的刻画符号，动物的、植物的、人物的，造像奇特，这些古怪的印痕，究竟是发源于巴人原始的艺术灵性，还是大自然神秘莫测的烙印？是装饰品还是占星术？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译的悬念。不过可以肯定这是巴人的精神文化创造，是否是早期的文字呢？史学界曾一度认为巴国只是个好斗的邦国，但却发掘出了“礼乐”用的编钟，显示了巴国具有

完整的礼乐制度，而且采用高超的饰金银工艺。出土文物中还有造型奇异的随葬兵器、柳叶形的青铜剑、荷包形的青铜钺。巴国还有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比如至今让人

象首耳兽面纹 西周

四川省彭县竹瓦街出土，这件巴蜀文化的代表性青铜礼器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竹瓦街，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此器的造型及纹饰与同一时期辽宁省喀左出土的青铜器物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通体以雷纹为地，盖为盔形，四周饰四鸟形卷身夔纹突棱，肩腹间饰立体象头双耳，圈足与下腹间有跪牛形突棱。

迷惑不解的“船葬”和“悬棺”。巴人确实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虽然最后被秦所灭，但早在灭亡的8个世纪前就与西周并流，共同汇入华夏文明的发展轨道。

但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巴人在康君一统部落前就与中原黄帝关系紧密，巴人与中原华夏属同一来源，甚至认为是黄帝所统率众多部落中的一支。而且，与巴人并称的蜀国，据说和“夏”同出于黄帝之孙颛顼。巴国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竟然与千里之远，被“蜀道难，难以上青天”的高山深谷相隔绝的殷商青铜器有完全相同的样式。因此巴国的文化并不是完全自生，而是与中原文明“本是同根生”。巴人与周代有关系这一点比较明确，但是否与黄帝、夏、商有关系还是个谜。

关于巴国的另一个未解之谜是巴人为何突然失踪了，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十数万巴人神奇失踪之谜，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苦苦追寻，试图找出谜底，但都难得其解。

有人说，巴国被秦军灭后，其人口也被全部坑杀，这种说法也许更多是基于秦军的残暴和坑杀赵军20万之说的猜测。

有人说，巴国人在灭国后，除死伤外都大规模迁移了。最近陕西商州地区考古专家在探寻商州900多个神秘洞窟起源时，又有了失踪巴人的惊人发现。据了解，商州发现的神秘洞窟均面山、临水，故每每进洞，须越过湍急的河流。洞内呈长方形，四壁平整，人工开凿痕迹明显。就目前已知的巴人习性而言，神秘洞窟的本身就与巴人在川生活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又发现了船棺葬的残存物，而且还有一些巴人文物相继出土。这些文物与三峡地区出土的巴人文物几乎如出一辙，其器具上的符号也惊人的一致。于是有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一度失踪的巴人是否像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那样，为躲避战乱而隐居起来？



说唱俑东汉（左图）

高55厘米。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出土。

侏儒陶俑东汉（右图）

高66.5厘米。1963年四川省郫县外北宋家林出土。

神秘洞窟莫非是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巴人的桃花源？

第三种说法是巴人并没有失踪，也没有离开本土，他们就是现在土家族人的祖先。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专家们利用 DNA 遗传技术试图分析古代巴人和今天土家族的关系，多次对三峡和清江流域一带的土家族人的血液和悬崖峭壁上的骨骸进行了基因对比实验。后来史料上之所以不见巴人，是因为巴国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人称呼巴人，而他们的后裔依然生活在这些土地上，形成土家族。考察土家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与遥远的巴人的确很相似。不过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公认。

奇异的巴人王朝曾有过血与火的历史，在史书记载上无一不是与战争相关联，这是个伟大的王国，还有太多的谜没有解开，让我们暂时无法进一步窥探他们的奋斗历程。

三星堆文化的无穷魅力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似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而三星堆则得名于河道南岸的 3 个大土堆。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29 年 2 月的一天，家住广汉市太平镇月亮湾的燕氏父子在浇灌农田的过程中，锄头锄到了一块石板，他们满怀惊奇地撬开石板，竟发现了满坑光彩夺目的玉石器。不懂文物的他们却肯定这是宝物，于是燕氏父子便在深夜偷偷将一共 300 多件玉石器取出，搬回家中。过了一年，燕氏父子见周围并无异常反应，为了牟利，他们便携带这些玉石器到城市的少城路——以前最大的古董市场去卖。据说这些被他们变卖的玉器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此多的罕见之宝涌入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在古董商和古玩家之间炒得沸沸扬扬。大批所谓的“淘金者”纷纷涌向月亮湾，去寻觅宝物。

三星堆遗址能以真面目示人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在燕氏父子出卖那些玉石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送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此人乃一介武夫，对古董一无所知，但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先生，请他帮助鉴别。葛维汉先生来自美国，对古董有所研究，他

看到这些玉石器后，眼前为之一亮，没想到如此精美的玉石器也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他初步认定了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是稀世珍宝。就在1933年秋，葛维汉先生与同是华西大学教授的林铭钧先生、戴谦和先生等人组成了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察。考古队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1936年，考古队将发掘所获加以整理分析，在《华西边疆学刊》上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的文章。在报告中，把有关遗址文物称之为“广汉文化”。不幸的是，第一次发掘工作仅仅持续了4年，就被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

第二次正式的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配合宝成铁路的建设，考古学家们又一次来到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继续十余年前对遗址的勘探。他们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他们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1963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发掘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带领他的学生进行的。他们来到月亮湾的高地上，极目远眺，顿感这是一块不凡之地。冯先生深有感慨，他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1980年，在发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的发掘全面展开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出土了不少陶器、玉器和石器，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4000多年前的墓葬。这些陶器、石器让人们了解了4000多年前古蜀人的文化特点，从而也从它们身上见识到了古蜀文化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次成功发掘的激励下，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继续前进，试图进一步揭开古蜀王国之谜。1986年7月23日凌晨2时30分，他们



祭祀坑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出土。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1号祭祀坑长4.4米，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玉器、陶器和青铜器等。

又有了一个重大收获。考古学家以竹签为工具，在谨慎的挑土过程中，发现了一小点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色物体，他们耐住性子，继续挑土，不一会儿，黄色物体显露的面积越来越大，还显出花纹来。先是一尾雕刻逼真的鱼映入眼帘，接着人们又发现了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这弯弯曲曲的黄色物体不断地延伸，竟长达一米多，令人惊奇的是，上面除了刻有鱼、鸟纹外，竟然还刻有一个王者之像。考古人员将这一发掘物称为“金腰带”。意识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即向政府请派军警保护现场，局面得到控制后，考古人员才公开了发现古蜀王“金腰带”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继“金腰带”之后，大量的玉器、象牙、青铜器及金器被陆续发现，尤其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考古人员不知疲倦的奋战下，一具具神奇的青铜面具，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玉器，闪闪发光的金鱼、金叶，离开了它们沉睡的泥土，发出了熠熠光辉。尤其是 1986 年发现的两座祭祀坑，是三星堆遗址的代表，它们的发现令世人瞩目。其中 1 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土堆南侧 100 米左右，坑是一个口大底小的长方形，坑内大概有 400 多件文物出土；2 号祭祀坑位于 1 号祭祀坑东南，相距大概 20 米，是一个坑壁稍微有些倾斜的长方竖穴，从这个坑里出土了 439 件青铜器，131 件玉石器，此外还有骨、象牙等器物。



青铜立人像

这些 3000 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十分罕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发掘，填补了美术史上商代大型雕塑的空白，它总体身高将近 3 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几尊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人像面部的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头上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发冠。它手臂的动作好像是在进献贡品，人像身着饰有巨龙、云雷、人面花纹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华丽。无论是从它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还是衣着来看，都体现了浓厚

的宗教色彩。因此，有的专家推断这个青铜大立像可能是一个象征着王者的“司巫”。在2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1件铜人头像，它们的大小、面部比例、神色与真人非常接近，大概也是巫师的形象。

在这两座祭祀坑中，人们还发现了一种被专家称为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那就是用青铜器制作的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近4米，由树座、主干和三层树枝组成，体态挺拔，装饰十分精美。树下底座为圆环形，上有一个描绘着云气状花纹的山形树座。高大的树干一共有3层，一层向外伸出3根枝条，每一根枝条上都站立着一只鸟，枝端挂着一个桃形的果实，十分精巧。除此之外，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树座下面背朝着树干跪着3个人像，他们的表情十分威严庄重，愈发使神树显得神圣无比。这棵神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据推测，后世兴起的“摇钱树”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座祭祀坑中除了青铜立人像和铜树外，还有玉石器和青铜礼器也是颇为重要的。出土的玉器，其中一部分像研、斧、凿、刀、锄、舌形器、椭圆形穿孔附饰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很明显是当地人制造的、蜀人本来就有过的玉器；而另一部分像玉璋、玉琮、玉戈、玉瑗等，它们的制造则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英国《独立报》曾以《中国青铜像无与伦比》为题发表文章，称三星堆青铜像是“古代最杰出的艺术制品”，而这次大量青铜文物的出现，也将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文明的无穷魅力。从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来看，商的势力和商文化的影响确已达到了成都平原。虽然过去专家们在研究殷墟卜辞时也曾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们怀疑商王朝根本无力攻入像四川这样的遥远之地，所以这些记载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于商文化是如何从遥远的中原地区传入四川的，专家们提出种种推测，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经过考察三星堆出土的若干青铜器，认为商文化可能是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经由淮河流域，穿过洞庭湖，沿着长江流域逐步发展到四川地区的。

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唯有在对这些遗迹和遗物的考察中，我们才能探寻到过去的讯息。当然，我们从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早期蜀王国灿烂文明的物质表现，至于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青铜艺术则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品味，去欣赏。

僰人悬棺为何凿于万仞绝壁

在我国四川南部的珙县境内，曾经生活着一支特立独行的少数民族：僰人。从春秋时期到明代万历年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生息、繁衍。在春秋时期，他们被称为“僰人野人”，在汉代，被称为“滇僰、僰僮”，明朝则呼为“都掌族”。然而在明神宗万历元年的“僰汉大战”之后，这个部落从此就神秘地销声匿迹了，除了悬在高达百米的断壁悬崖上的265具棺材，他们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其他的信息。

这些高高在上的“僰人悬棺”总重超过千斤，都是用质地坚硬的整木雕凿而成。其外形主要有船形和长方形两种。有的选择最为险峻的天然或人工凿成崖石安放，棺木还裸露在外面；有的在绝壁上凿孔，插入木梁，把棺木架在上面。悬棺离地面数十米到一百多米，在山风中凌空俯视地面，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这些悬棺已经在高高的空中悬挂了数百年，经历着风风雨雨的剥蚀，至今仍牢实地迎空展示着。悬棺的崖壁上有许多红色彩绘壁画，内容丰富，线条粗犷，构图简练，形象逼真。

现存悬棺最集中的地方是宜宾地区珙县洛表乡的麻塘坝和曹营乡的苏麻湾两处景区。其中麻塘坝亦称僰人沟，距四川省珙县城60千米，南北狭长，东西两侧奇峰挺拔，险拔峻峭的岩穴之间现存有悬棺160多具，许多棺木半悬山崖，距地面一般高约25至50米，最高的有100多米。苏麻湾距麻塘坝10多千米，在陡峭的石灰岩壁上分布着48具悬棺，沿着浩浩荡荡的江水，人们在船上就可以看见这些奇特的悬棺。

僰人为何要把棺木高悬于千仞绝壁之上呢？专家们认为，按古僰人的意思，悬棺入云，是吸日月之精气。从科学上来说，西南地区的少数

民族由于长期居住在山水之间，他们对山水怀着无比崇高的感情，死后葬在靠山临水的位置表明亡灵对山的依恋和寄托之情。至于把棺木放得很高，那是因为高处可以防潮保尸，并可以防止人兽的侵扰。

可是所有放置悬棺的地方，上至峰顶，下距空谷，都有数十米到一二百米，而且到处都是异常陡峭的石壁，没路可走。古人是怎样将这些悬棺放置到悬崖峭壁上去的呢？对此，人们多方猜测，代表性的解释有“栈道论”和“吊装论”，还有“洪水说”、“隧道说”、“天外来客说”等等，众说纷纭，悬棺因此被蒙上了一层异常神秘的色彩。

“栈道论”认为，悬棺是通过修栈道运到悬崖上的洞穴中的。古人可能就像今天造房子搭架子那样沿着悬崖向上搭，当搭到洞穴口时便可将棺一层层递上来，直至送入洞中，或者由山顶搭栈道向下直至洞口。证据是现在只要乘竹筏沿九曲而游还可以在两岸的岩壁缝隙处看到一些残存的木料，这就是安置船棺后为确保它的安全而将栈道拆除的遗物。但是存放船棺的悬崖多是单独成峰的，突兀峭拔，崖壁坚硬，由下而上搭架子能搭到数百米谈何容易，特别是在工程技术还极其落后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很难实现。“吊装论”认为悬索下枢可以解决千斤之物如何挂上悬崖的问题。1973年9月，公安部门曾侦破了一起盗悬棺案。两名盗贼供认，他们买了数百千克粗铁丝制成软梯，上端紧绑在岩顶的大树根部，一人把风，一人顺梯而下至洞穴，再设法在崖壁上开辟一条栈道，随后盗棺而出。有些人因此认为僰人是反其道而行：先找到安葬洞口，在洞口前架设数米长的栈道，棺木在峰顶就地制成，装殓死者后吊坠而下至洞口，再由人推进洞去。但人们至今不能断定古人是用什么简陋的机械将悬棺放到洞穴里。因为山顶到洞谷一般均有一二百米，鞭长力微，即使百人在峰顶一起用力绞拉辘轳之类的简单机械来吊升岩底的棺木，



四川珙县悬崖峭壁上的悬棺近景

一具具棺木悬挂于万仞绝壁之上，充满了永恒的神秘色彩。

吊到洞口时也不能放进穴内。

悬棺隐身在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充满了永恒的神秘色彩，它作为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奇迹，沉积了往日逝去的回忆。僰族为何悬棺而葬？刀耕火种的年代如何置棺高岸？僰族人是怎样消失的？棺上的红色岩画又在讲述什么故事？这些谜还有待解答。

秦始皇身后留下的悬案

秦王嬴政用了10年时间，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秦始皇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加强帝国的统一和稳固，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堪称千古一帝，被西方人尊为“东方的拿破仑”。但是，他12年的统治也充分暴露了他狂妄自大、专制暴虐、穷奢极欲的本性。所以，有人对秦始皇做过这样的结论：秦始皇，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青史，因实施暴政遭千古骂名。

其实，千百年来，引人注目的不仅是秦始皇的功过，他的身世、死因，甚至他的陵墓也因众多未解谜团而备受关注。

谁是秦始皇的父亲

秦始皇留给后人的一系列悬案中，第一个就是他的身世之谜。关于秦始皇身世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他是大商人吕不韦的后代；有人认为他是正宗的秦国王室血脉，即子楚的儿子。

最先提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观点的人，应该是司马迁，因为在他之前的史书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论述，直到《史记》问世后，人们才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吕不韦把已有身孕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为妻，时隔不久，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赵政。

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代，乃至从汉到宋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什么争议，甚至他的观点还被沿用到后来的权威史学论著之中，比如，东汉班固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还直接称秦始皇为“吕政”。

无论是班固还是司马光，在中国史学界，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

让人尊敬、值得信赖的。人们相信他们之所以会采用司马迁的观点，应该都是经过考证的。所以班固和司马光对司马迁的认可，无疑更给“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的论断增加了可信度。

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历史观、价值观的变化，后世之人开始对司马迁的观点产生了质疑。据记载，质疑的开端是从明人汤聘尹开始的。汤聘尹在自己的《史稗》中明确地提出了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不可靠，他认为“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实乃“战国好事者为之”。

汤聘尹的论断一出，立即引发了“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和“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持久论战。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首先以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压人：司马迁治学严谨，不会贸然记述此事。言外之意就是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不该被否定吧。



吕不韦像

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人以牙还牙，同样以《史记》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说，《史记》记载，(赵姬)至大期时，生子政。期，即一周年。就是说子楚娶了赵姬一年后，赵姬才生嬴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时间上看，嬴政是子楚所生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再说，如果赵姬真的在进宫之前已经怀孕，迁延日久，秦始皇就会不及期而生。身为一国之君的庄襄王子楚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的。如果他发现嬴政不是自己的骨血，又怎么能立他为继承人呢？

真是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可是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并不认可，又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汉代以后的诸多历史资料都认可该说法，承认“嬴政是吕不韦之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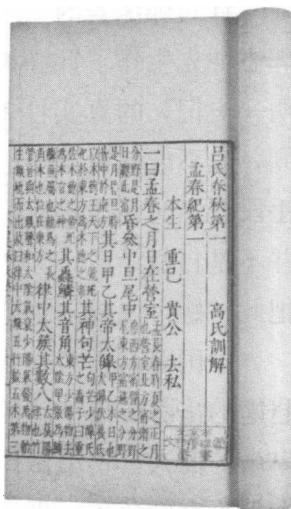
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人解释说，这很可能是后来的史学家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内宫如此污秽，王位继承制这样混乱不堪，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故秦二世亡是自然的。另外，秦末的人们愿意承认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子孙，因为这样他们

就会有很好的造反理由，为推翻秦朝在舆论上做准备。

由汤聘尹引发的争论，激发了不少历史学家的兴趣，也赢得了一些历史大家对“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支持。与汤聘尹同朝的王世贞、清代的梁玉绳，都作了相关的考证，并分别在《读书后》和《史记志疑》中支持汤聘尹的观点。王世贞还提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

认为嬴政是子楚骨血的学者也不甘示弱，又提出新的论据：秦昭王在位时，子楚还在赵国做人质，他会轻易地将王位传于一个在敌国当人质的王子吗？子楚的命运都握在赵国人手里，飘忽不定，他未来的儿子的命运更难料定。如此说来，当年吕不韦阴谋得逞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反对者则说，吕不韦本来就是一个大投机者。只要有一线希望，他是不会放过机会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秦始皇身世问题再一次成为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这一轮争论是从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特别考证开始的。在《系年》中钱先生否定了始皇为吕不韦子之说，否定了吕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吕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紧接着，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也提出了怀疑。书中，郭沫若先生提出了三个疑问，为什么仅见《史记》中有记载，而《战国策》却半字未提呢？这个故事及类似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情节就像小说一样，可信吗？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显然说赵姬不是吕不韦买来的歌姬，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郭沫若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看法，即“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种说法始于西汉初年，是吕后授意编造、散布的，目的无非是为她的夺权作铺垫。当时她就曾让诸吕散布谣言说天下本是吕家的，是被刘家夺去的。也就是说，吕家夺权是



《吕氏春秋》书影

此书为吕不韦组织其门下食客集体创作而成，分12纪、8览、6论，共26卷，20余万字。